

2020年了，依然有很多人，将婚姻与生育视为一个女人存在的最大意义。“不被任何人定义”“坚持做自己”，是少数派的特权。

无形中，它传达了这样的价值观：女性只有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傲人的颜值及精神状态，才能得到社会资本肯定。

也就是说，混得好的姐姐，值得被尊称一声“姐姐”。混得不甚如意的姐姐，就成了在社会话语中消匿的大娘。（想到几年前“大叔”与“师傅”称呼间的调侃了吗？）

成功学，非常成功学。

从这样的立场解构，我们可以总结，《浪姐》的慕强倾向颇明显；我们更无语而忧伤地发现，绝大多数的女性，按节目的慕强倾向，都不是姐姐，是大娘。

此外，补充一点，被大加褒扬的“浪姐”间的互相赞美和欣赏，亦弥漫着阵阵缥缈虚幻之味。群芳鲜妍，在道上大大小小各占一席之地，心知肚明，该综艺本质上是无害的，动不了自家的奶酪。既然如此，何不作出磊落、亲切的姿态？全是加分嘛。这就像古时候天冷飘着鹅毛大雪，富人家围裹狐裘喝酒赏梅——大雪，恰是“风雅”的加分项——而流浪街头的乞丐们，只能被迫为抢到一个馊掉的馒头搞到头破血流。

乘风破浪，是要资本的。

现实里的“魔咒”

《浪姐》形成的饭圈生态，一

举多得。它解决了大部分一线城市女性选拔“符号玩偶”的困难，也解决了普罗大众的yy之需，更满足了资本等待回报的诉求。我们不必将节目的涵义拔得过高，但我们也应该承认，改变，是要被鼓励的。权利、权力的斗争，向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在目前的社会舆论环境中，《浪姐》所引发的系列对于女性议题的探讨，不啻一个不错的开端。

考虑到女明星们精致华丽的生活没多大示范作用，记者真正关心的是，跳离《浪姐》，进入现实，我们身边数不胜数的、平平无奇的中年女性，是否都能打破传统社会残忍施加的那些顽固的“魔咒”呢？

包括——

对女性躯体之衰老的凝视与苛责（标准比男性高得多）。逐渐发胖、身材走形是不可原谅的，性别身份限制了一切，所以，太多可怜的女性，在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广告和医美整容中沦陷。

职场与家庭难以兼得。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，甘愿浪费自身才华，受困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吗？当主妇承担着无法被量化的家务劳动，她们如何忍受自我价值得不到承认的痛苦？选择职场，职场有“性别天花板”，各种显形、隐形的歧视无所不在；选择家庭，女人们又在“独立的骄傲”和“讨好丈夫的娇妻”之间徘徊，犹疑不定。

她们并非不具备“出走”的能力，却依然受到家庭与社会伦理的羁绊。2020年了，依然有很多人，将婚姻与生育视为一个女人存在的最大意义。女人不是平等于男人的活生生的“人”，女人是移动的子宫，是教养下一代的免费保姆。

“不被任何人定义”“坚持做自己”，是少数派的特权。

……

不淡了。再一段段罗列下去，《浪姐》的配套众筹节目《水姐》（活得“水”，浪不起来）都能出炉了。

不得不提一提2019年上映的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。韩国的这部女权主义色彩浓烈的电影，戏里女主哭，戏外女观众哭，基本把男权社会的“厌女”现象说透了。“厌女”不是新鲜事，非韩国独享，亦非东亚特产。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，在大多数地区，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，这是一个漫长无尽的偏见，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。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如是定义，“厌女”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，而将女人置于客体，将女人“他者化”，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日本陆续通过了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，女性逐渐从“私领域”走向“公领域”，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，但是，大部分的女性仍旧受到传统父权制结构下的暴力统治，女性依旧生活在巨大的割裂中。举个例子，今年7月的新闻：一位日本妈妈在超市买成品土豆沙拉，某路过的陌生大爷居然立即就指责道，“身为母亲，土豆沙拉什么的，好歹自己做吧”。旁观者将此情景发上推特，主妇听